新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改革的挑战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摘　要]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是党中央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发展趋势的重大科学判断。面对新动荡变革期下世界陷入极度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严峻国际形势，全球治理改革面临着美西方利益集团的掣肘、全球治理改革“中国之治”与“西方之治”的对立、全球治理改革主要行为体对抗式制度体系的负外部性、全球治理改革行为体信任赤字的加剧与价值共识的深刻分歧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稳步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并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影响力、塑造力和引领力，首先，要加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在对外开放中持续提升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以此为基础渐进改变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角色；其次，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强用中国价值理念等智识元素对全球治理改革的引领，形成中国原创的全球治理改革理论，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最后，要加强与不同行为体的协调与合作，找到合作与斗争的平衡点，持续扩大合作的外溢效应，进而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将全球治理改革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

[关键词] 新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改革；中美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文明互鉴与对话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4）09-0016-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1]　26。在此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重，成为全人类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在全球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中，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所反复论说的，对全球治理行为体来说都至关重要的一大需求，就是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基于此，本文认为在世界新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全球治理改革，要重点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世界新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什么？第二，面对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参与者，应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进而提升全球治理的治理效能？这是当前全球治理改革研究亟待解答的重大问题，既关乎全球治理改革的实际进程，更关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战略目标的实现，

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一、新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改革的严峻国际形势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进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将更为严峻。因此，中国在世界进入新动荡变革期这一时代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首先必须弄清楚世界新动荡变革期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这将成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中进行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

首先，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建立。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现行的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和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WTO等多边国际组织为支柱的国际经济秩序。两极格局解体后，美国建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全球强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单边发动数次战争并多次挑起局部冲突，而且在国家利益优先下大搞非法制裁、极限施压，在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持续拱火。而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诸如此类的单边主义行径无能为力的窘境，不仅使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依赖的诸多多边机制和核心机构濒临崩溃，也严重冲击甚至颠覆了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使其权威性与合法性因缺乏认同而日渐式微。因此，从各方面来看，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失序”中加速崩溃。正如美国学者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所认为的那样，美国精心建构的以“帝国政治”为主要特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会持久。虽然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崩溃并不意味着会迅速建立一个新秩序，而且各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具体轮廓也缺乏共识，但在新旧国际秩序的交替期，各国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崩溃中，抓住一切机遇进而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区域乃至国际秩序。这样一来，各国“关于未来新秩序的图景往往彼此冲突”[2]，因而各方力量将会在激烈的较量中进行重组甚至爆发冲突，亦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言：“当一个不稳定的和衰落的大国想维护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并且优势还在自己一方时，它就会突然卷入战争。”[3] 184所以，“所有国际秩序崩溃或恢复的背后都是血与火、暴力与战争”[4]。这既是世界处于新动荡变革期的深层根源，又是其显著表征。

其次，深刻的结构性地缘政治分歧与此起彼伏的局部冲突。结构性地缘政治即国际权力的分布格局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形成的战略形势以及此种权力分布对有关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冷战后，美国为巩固单极世界霸权，一方面，渐进加强对俄罗斯在战略空间上的挤压；另一方面，加紧在中东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并打压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反对力量。由于美国长期对外扩张，导致其国家实力大幅度下降

，越来越无力单方主宰世界。而迅速崛起的中国不仅与美国综合实力愈发接近，更是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一定的领导角色，从而被美国视为挑战。对手基于此，美国为实现“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并巩固美国国内复兴”这一战略目标，通过政治围堵、脱钩断链、极限施压、单边制裁等方式极力打压、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并大肆渲染“中俄威胁论”，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地缘政治挑战”，将俄罗斯视为对美国具有严重威胁的国家。此外，从中东局势来看，美国联合其盟国打击叙利亚、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在巴以冲突中持续拱火，以致中东安全局势和地缘政治持续紧张。所以，从中美关系来看，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双方围绕中国南海和台湾问题爆发热战的风险显著上升，而这又密切关系到朝鲜半岛和全球的和平形势，从而加剧了亚太乃至全球形势的动荡。从美国对俄罗斯的遏制来看，美国力主北约强势东扩，导致俄乌冲突爆发，其持续东扩和欧洲多国卷入冲突不仅造成欧洲地缘政治持续紧张，而且还引发了难民问题、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核危机等次生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和全球的动荡。从中东来看，美国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径导致中东冲突不断，特别是巴以冲突的再次爆发，不仅将导致中东和平进程彻底走向死亡[5]，更加剧了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核扩散风险，从而使中东动荡局势乱上加乱。总之，这些结构性地缘政治分歧及其所引发的潜在和现实局部冲突，导致国际社会围绕全球治理所进行的合作努力和趋势在退向“冲突型安全文化”[6]中濒临中断，进而使世界长期陷入极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之中。

最后，地缘经济的碎片化与全球经济持续下行的极大不确定性。自经济全球化以来，开放型世界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贸良性发展至关重要的前提，而这又是维持世界和平稳定不可或缺的条件。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速显著降低，而美国过度印钞和加息的低效应对方式，不仅使世界通胀居高不下，也严重弱化了美元霸权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稳步增长不仅逐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在显著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同时，更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全球经贸的引领者，也因而被美国视为威胁和挑战。为此，美国坚持国家利益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并始终将全球经贸地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从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以及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的小圈子，到拜登政府在AI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和极力打压遏制，再到俄乌冲突中以美国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将俄罗斯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并冻结其海外资产和出台能源进口禁令等一系列非法经济制裁，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开放型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受阻，国际贸易壁垒增加和金融投资风险加剧，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由全球融合转向区域自给，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全球化——区域化——本土化的逆行倾向。可以说，美国将全球经贸地缘政治化的单边主义狭隘行径，不仅导致全球地缘经济的碎片化日益加剧，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全球化被撕裂的风险，更使全球经济在下行中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

总之，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从各方面来看，都表明“全球政治文化正在颇为显著甚至急剧地朝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方向变更”[7]。部分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仍抱持零和博弈思维，全球主义的价值理念已经逐步让位于国家主义，以致全球治理这一被国际社会寄予重望的多边主义国际机制不仅在规则的确立、调整和贯彻上面临空前的困难，而且在处理一系列复杂且新兴的全球性问题和区域性问题上显得愈发呆滞和低效，致其公信力大大降低，甚至面临被裂解的挑战。因此，在世界动荡变革期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可谓十分严峻。

二、新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改革的挑战

世界进入新动荡变革期，意味着冷战后一直为各国所熟悉的那个相对稳定的世界正加速消亡，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极度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剧增，人类正在被带入一个愈加危险的世界。在这恰恰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维护全球治理多边主义国际机制，并加强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协调与合作的危机时刻，部分大国仍偏执于零和博弈，一些小国则自顾自保，致使全球治理举步维艰。因此，为维护世界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亟待加强全球治理改革，但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全球治理改革面临着空前的严峻挑战。

首先，美西方利益集团的掣肘。由于全球治理改革将从根本上触及美西方利益集团的霸权地位和特殊利益，以致处处被其掣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打压遏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力量。从目前来看，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力量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由于既有全球治理的低效及其组织构架越来越不符合国际社会的需要，中国多次表明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并推动其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俄罗斯也是多次表明要推翻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以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新需要。因而，美西方利益集团针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了分门别类的打压遏制方式，即对中国进行政治隔离、贸易制裁、金融脱钩、技术封锁；对俄罗斯进行政治围堵、外交孤立、经济封锁、金融制裁、资产冻结，这既严重分散了中俄两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精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两国的综合实力，从而弱化了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力量。其二，阻碍全球治理多边机构的改革。在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上，美国最初坚决反对对其进行改革，拜登执政后，为了绕开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对美西方霸权的束缚，无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性中的合理需求，极力推荐其盟友成为常任理事国，以致改革在多方反对中陷入僵局。如在IMF的改革上，美西方利益集团试图在不改变现有份额占比的基础上等比投资，进而维持其在重大事项上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这一特权。这不仅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美西方在IMF份额占比、增资方式、投票权重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愈益扩大，使IMF的代表性和治理结构备受质

疑，也使其改革在南北双方的巨大分歧中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可以说，正是由于美西方利益集团的处处掣肘，导致全球治理改革陷入难以调和的僵局，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呆滞和低效。正如美国学者雷勒·伯曼(RainerBaumann)所言，美国绝不容许出现违背其国家利益的治理形式，从而成为阻碍全球治理发展的重要力量[8]。这既是全球治理改革的深层原因，也是其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

其次，全球治理改革“中国之治”与“西方之治”的对立。中国和美国既是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从双方所掌握的资源和国家综合实力来看，如果双方能加强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协调与合作，不仅可以建设一个开放、普惠、共享的全球经贸体系，更可以建设一个均衡、稳定、有效的全球安全体系，进而在增强全球开明秩序中稳步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然而，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由谁所主导的“位置问题”以及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在全球治理改革上虽有合作，但在争取自身的核心利益上，双方都不愿意被对方所主导或主动放弃自己的核心权益，“显然又都各有想法、各有战略、各有行动，双方的政治互信、安全互信有限”[9]。就美国而言，美国学者凯瑟琳·韦弗(CatherineWeaver)认为，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目的就是在重构联盟与伙伴关系中强化战略参与，防止霸权衰落，进而维系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这表明美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一切行动就是为维系美国自由霸权这一目的服务，因而由美西方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改革注定是保守的和排他的。相比之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根本目的主要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0]，进而增进世界人民福祉。所以，在全球治理改革中，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11]545，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多边机构更好发挥作用，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进而推动全球治理机制、规则朝着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方向发展。从中国的诉求来看，中国既不会“另起炉灶”，更不会与美国争霸，但一定会反对霸权主义，这就必然与美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相矛盾。所以，全球治理在机制、方案、方向以及理念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将长期呈现“中国之治”与“西方之治”、“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态势，而且伴随双方力量对比消长的变化，这种对立态势还将以多种形式展开并继续下去，从而构成全球治理改革的结构性挑战。

再次，全球治理改革主要行为体对抗式制度体系的负外部性。随着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增多，全球治理参与主体已经由主权国家扩展至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在内的诸多行为体，但从行为体可调配的资金、技术、人才和资源来看，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中最有能量的主要行为体，因而也是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行为体。新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面临极大困难以及全球治理改革进展缓慢，表面上是因主要行为体自顾自保，合作意愿衰减，义务分配困难所致，而其深层根源则在于主要行为体国内对抗式

制度体系的负外部性。所谓对抗式制度体系的负外部性，即在“按照制衡和分立原则安排国内政党、行政、立法、央地关系的制度模式”[12]下，这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意愿和能力被国内日益增加的政治极化和各方力量的相互否决所限制，以致这些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往往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可以说，受对抗式制度体系的负外部性影响，全球治理改革的紧迫性及其所必需的集体性行动，往往与主要行为体所确立的优先事项和国家利益相冲突，而且在全球治理改革的责任、承诺以及协调上充满随意性、脆弱性和反复性，即要么无法做出明确和连贯的承诺、支持与行动，要么因国内政治分裂而无法履行承诺，要么以各种名义拒绝合作，要么无视全球治理多边机构和具有重大约束力国际协议的权威性，选择随意加入或退出。特别是对抗式制度体系的负外部性在大国对外政策中成为常态时，对全球治理改革带来的冲击更为严重。比如美国作为对抗式制度体系负外部性最典型的国家，其负面示范导致对抗式制度体系的负外部性在越来越多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出现，进而使行为体在全球治理改革合作上的能力和意愿严重受限，从而使全球治理改革在集体性行动的困境中面临极大挑战。

最后，全球治理改革行为体信任赤字的加剧与价值共识的深刻分歧。全球治理改革是为了有效解决“人类整体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塑造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与秩序的规则、机制，以达到促进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目标”[13]。这不仅需要多种行为体的跨国合作，更需要行为体间彼此互信和存在价值共识。建构主义认为，互信和价值共识作为行为体“谈判的共同语言 □□□ □□□南□ □ □□ □上合作的纽带，也降低了他们在全球治理改革问题上产生冲突的程度。但在世界新动荡变革期这一最需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艰难时期，行为体从各自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外政策急剧地朝国家主义方向变更，“同时迷恋种种不同类型的沙文主义”[14]，要么零和博弈，要么划圈筑墙，不仅大国之间缺乏战略互信，而且小国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也由于不同原因缺乏互信，以致全球治理多年来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合作型价值共识正在深刻的分歧中加速消失。比如面对动荡变革期下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并且失衡和分化趋势愈益扩大这一全球性挑战，行为体本应秉承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稳定的国际环境，并推动全球多边治理机构改革以最大限度发挥其治理效能。但应然往往远异于实然，行为体要么采取更为保守的立场，要么从大国博弈的视角来看待全球治理改革，并始终将全球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以致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多方合作日益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趋势。此外，从新一轮的巴以冲突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多次呼吁双方停火，从而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加剧和冲突事态的扩大，但以美国为首的利益小圈子不仅拒绝双方停火，反而持续拱火拉偏架，以致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巴以冲突停火的多轮表决均无法通过，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的挑战。因此，新动荡变革期，行为体间互信的缺失和价值共识的深刻分歧，对全球治理改革是极具破坏性的。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战略选择

从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角色来看，中国首先是重要参与者、合作者和贡献者，其次是渐进性的改革者和引领者，最后就全球治理改革的不同议题而言部分是保守者，部分是激进者。因此，在世界新动荡变革期扑朔迷离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应在保障其改革整体进程稳定性的基础上审慎地积极进取，从而避免全球治理改革因较大的震荡而陷于中断。同时，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既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更重在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15]。在此背景下，如何稳步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并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影响力、塑造力和引领力，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

（一）加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渐进改变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角色

全球治理改革不仅源于既有全球治理的低效，也源于国际力量的对比消长变化。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利益攸关方向全球治理改革的推动者和有限引领者转变的“前提是自身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提升”[16]。从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来看，目前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角色定位主要是参与者，而非引领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综合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引领者这一角色，以致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美西方国家单方主宰下的全球治理的改革，不仅在艰难中行进，而且实现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战略目标也愈发艰难。

基于此，新动荡变革期，面对明显不符合大多数国家国家利益的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战略实践除了坚决阻止任何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外，首先应加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这是因为我国目前还存在一定数量和不同程度的困难群体；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1] 14；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我国仍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的治理上，这不仅分化了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精力，而且严重制约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整体实力，更是直接决定了我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角色定位和影响力。这样一来，鉴于世界新动荡变革期下国际国内的总体经济形势，中国必须将工作重心放在促进国内经济稳步增长、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深化改革以及专业人才培养上，既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又要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持续提升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进而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度跃升，不断缩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综合实力的差距。这不仅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中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目标的基础，更是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从参与者角色向引领者角色彻底转变并有效推进其改革的

基本前提，因而加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应成为我国未来一个时期内压倒性的战略重心。

（二）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作为一种以非暴力、非强制方式改变他国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方式[17]，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反映[18]。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国际话语权并未随着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而得到应有的提升，反而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长期压制和歪曲下被边缘化，以致中国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的话语力和影响力明显不足。为此，世界新动荡变革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战略实践在加速提升国家硬实力的基础上，应加快构建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话语体系，进而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9] 38。但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过程中，将我国的智识资源和核心利益诉求嵌入其中，进而在展现我国国际领导力的过程中提升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话语权。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点。

其一，构建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理念话语权，加强中国价值理念等智识元素对全球治理改革的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全球性挑战威胁加剧背景下人类共命运、同利益的现实，中国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价值理念和方案选择。其内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等诸多价值理念，不仅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更是与美西方治下的零和博弈、自私自利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我国在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既要不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原创的价值理念，更要将这些价值理念通过多种方式融入全球治理改革之中，并与全球治理改革正在进行的一系列行动结合起来，进而在不断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理念认同感的过程中提升中国的理念话语权。

其二，构建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制度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制度话语权作为国际制度和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因素，被国际社会接受的程度往往较高，其主要以制度化的方式影响全球治理改革，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有力保障[20]。为此，我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积极推动现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提升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多边机构中的投票权和占有份额，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多边机构的人事安排，从而使其更好地体现国际力量的对比与变化。二是发挥中国自身优势，创建全球治理新机制，提升全球治理改革议题设置和主导能力。比如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创建的机制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涉及一系列专业领域的多边对话合作

平台。中国不仅在发展议题的设置和引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有效凝聚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识，同时中国还凭借创始国议程设置的有利地位，阐述了中国在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绿色发展、能源等问题治理上的主张，有力促进了利益相关方的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凝聚了全球治理改革共识。所以，在全球治理改革上，中国应“积极主导议题选择，不断扩大议题利益相关方，强化自身议题联盟的形成，推动议题进入议程”[21]，进而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制度话语权。

其三，构建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学术话语权，形成中国原创的全球治理改革理论。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学术研究不仅能为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撑，而且“还能从学术角度捍卫中国的国家形象”[22]。为此，一方面，学术界需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科学回答，诸如我国应如何看待全球治理机制，全球治理机制“究竟是国家间权力政治失灵之处的补充”[23]，还是其本身就是多主体进行“合作的全球舞台”？我国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超国家利益性质的国际规范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与不同行为体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学术界如何将党中央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高度政治化的话语转化成学术话语，并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改革理论框架等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作用发挥和话语权大小。另一方面，学术界应从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实践中总结规律性的认识，提出新概念、新观点，并加大中国全球治理改革学术研究的国际传播，使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理念、理论与实践进入全球学术视野，成为研究主题并融入全球学术话语[24]，使中国原创的全球治理改革理论成为世界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在丰富世界全球治理理论中塑造我国的全球治理改革学术话语权。

（三）加强与不同行为体的协调与合作，确保全球治理改革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实现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及其改革的实现一定是在不同行为体的和平合作中实现，因为全球治理改革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事情，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当前，全球治理改革遭遇极大困难恰恰是由于部分主体不合作所致。因此，世界越是剧烈动荡变革，中国越是需要着重考虑如何与不同行为体进行协调与合作，进而在同各方的携手共进和互利共赢中稳步实现全球治理改革。基于此，笔者建议如下：

第一，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与合作，形成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合力。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和实力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对全球治理改革和人类前途命运负有重大责任使命，如果双方深化合作，则可以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中有效解决诸多全球性问题。这既符合双边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利益。所以，美国是否合作以及合作程度的大小决定了全球治理改革的结果。基于此，我国应在坚守自身核

心利益的基础上，妥善管控双方分歧，加强双方在全球治理改革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上的对话，推进双方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互利合作，努力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改善与美国现有伙伴的关系。虽然双方在全球治理改革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还严重缺乏正确认知，但无论从美国自身的问题来看，还是从全球性问题的治理来看，美国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强调愿意同中国加强在全球治理、经贸关系、气候变化、禁毒、人工智能以及教育科技等重要领域的合作，中国也强调“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25]，这表明两国存在宽广的协调合作基础和广袤的共赢空间。亦如西方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认为的那样，美国更倾向与大国的协调与合作，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依赖大国维持现有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实力衰落不得不同大国进行合作[26] 286。同时，中国应加强与美国在承担大国责任上的协调与合作，形成彼此认同的合作模式。为国际社会贡献优质公共产品既是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更是全球治理改革所关涉的核心问题。过去美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并为其他行为体提供发展机遇，塑造了其全球治理领导者的地位，然而随着其实力的衰落，一方面美国单方面无力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不容许任何损害其国家利益的全球治理改革。所以美国对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实际上，中国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不仅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反而是美国的机遇，是双方相互成就和互利共赢的过程。因为，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不仅始终对美国开放，而且中国“也愿意参与美国提出的多边合作倡议”[27]，更是多次强调既没有超越或取代美国的规划，也不会走国强必霸的歪路。因此，地球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国，双方不仅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而且完全可以在对话合作中弥合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分歧，进而形成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合力。总之，世界越是不稳定，中美双方越是需要在全球治理改革上加强协调与合作，进而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的过程中造福世界。

第二，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壮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力量。金砖五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是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其强势崛起不仅有力冲击了美西方单方主宰下的全球治理格局，也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由于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上共识相对较少、“互信程度相对较低”[28]，以及成员数量少且发展不平衡，导致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还不强。为此，中国作为金砖国家的创始国和核心力量，首先应与其他成员国围绕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逐步将金砖机制打造成一个兼顾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的机制化平台，并发挥成员国各自优势在更多层级、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开展合作，进而在“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29]中提升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和整体实力，这是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发挥影响力的前提。其次，中国应着重加强与金砖成员在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协调与合作，努力消除成员国在全球治理改革方向、进程等问题上的分歧，塑造成员国

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共同利益愿景，以此增进金砖国家内部的战略互信、凝聚力和行动合力。同时，在此基础上与金砖成员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中国三大全球倡议，共同为国际社会贡献公共产品，从而切实增强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影响力和引领力。最后，稳步推进“金砖+”扩员进程。“金砖+”扩员是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趋势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将显著提升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代表性、发言权和竞争力，而且将进一步冲击美西方单方面主宰下的霸权治理和强权政治，从而深刻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权力格局。因此，未来中国要毫不动摇推进金砖扩员进程，协调内部团结合作，从而在不断壮大金砖国家综合实力过程中使全球治理改革的主导权持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四、结语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旧秩序加速瓦解，大国冲突与对抗强势回归，全球治理改革面临极大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和有限引领者，越是接近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战略目标，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阻力和不确定性风险就越大，“来自外部的打压和遏制”[1] 26也就越成为改革进程中的常态。因此，世界越是剧烈动荡变革，外部的风险挑战越是严峻，中国越是要保持战略理性和战略定力。这就要求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战略实践中，总体上秉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30]，既要抓住世界新动荡变革期的战略机遇，敢于担当，合理规划，积极进取；又要加强与不同行为体的协调与合作，找到合作与斗争的平衡点，持续扩大合作的外溢效应，进而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将全球治理改革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更是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张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中国参与[J].社会主义研究,2022,(6).

[3]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4] 郑永年.乌克兰战争与世界秩序重建？[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02-27.http://ex.cssn.cn/zx/yw/202202/t20220227_5395735.shtml.

[5] 刘中民.单边主义行径祸乱中东[N].光明日报,2018-05-17.

[6] 秦亚青.美国大选与世界格局的走向[J].现代国际关系,2020,(12).

[7] 时殷弘.全球化的内在紧张、急剧变化和应对战略[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3).

[8] Rainer Baumann.Incompatible Conceptions of Global Order？Empire,Hegemony,and Global Governance,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6th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f the Standing Group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urin[R].2007．

[9] 刘建飞,谢剑南.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J].太平洋学报,2018,(1).

[1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

[11]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2] 苏长和.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变革：挑战与前景[J].当代世界,2021,(7).

[13] 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04,(1).

[14] 时殷弘.全球治理和开明秩序面对的倾覆危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6).

[15] 王媛媛.“国际正义与全球治理”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决策与信息,2023,(3).

[16] 赵长峰,李云龙,余沐岚.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历程、成因与经验[J].社会主义研究,2

023,(3).

[17] 江涌.中国要说话,世界在倾听——关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J].红旗文稿,2010,(5).

[18] 刘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N].光明日报,2023-06-30.

[19]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0] 高奇琦.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保障 提高我国制度性话语权[N].人民日报,2016-02-03.

[21] 吴志成,李冰.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的中国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9).

[22] 江时学.论中国的国际话语、话语权及话语力[J].国际关系研究,2023,(3).

[23] 俞正樑,秦亚青,郝叶力,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研究重点与路径建议[J].国际观察,2021,(3).

[24] 孙吉胜.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J].当代世界,2022,(10).

[25] 钟声.做伙伴才是面向未来的正确选择[N].人民日报,2023-11-21.

[26]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2 .

[27] 钟声.承担大国责任才能合力造福世界[N].人民日报,2023-11-24.

[28] 何帆,冯维江,徐进.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4).

[29] 习近平.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的讲话[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19).

[30] 张丽华,付悦.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J].理论探讨,2024,(1).

[责任编辑：汪智力]

Challenges of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in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ZHANG Zhuo

Abstract: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which is a major scientific judgment mad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governance.Faced with the sever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which the world has fallen into extreme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in a new phase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leading to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facing the constraints of US and western interest groups,the opposition between "Chinese governance" and "western governance"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the confrontational institutional system among the main actors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and the intensifying trust deficit among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actors deep differences with value consensus and other challenges.In this context, China should steadi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enhance its influence, shaping power and leading power in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First,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its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world market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so as to gradually change China's role in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Secondly, we shoul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enhance the guidance of intellectual elements such as Chinese values o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form China's original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and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voice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Finally, we shoul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different actors, find a balance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struggle, and continue to exp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ooperation, so as to turn the beautiful vi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into reality in the way of peaceful cooperation.

Keywords: the period of new turbulence and change;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China-US relation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voice; mutual learning and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收稿日期] 2024-03-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KS042）

[作者简介] 张鹭，男，山东五莲人，法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院长助理，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研究。